

王国维与上海

陈同

本文从王国维与上海的关系出发,探讨上海在王国维一生的学术生涯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晚年王国维学术路向的转变。认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王国维是伴随着上海成长起来的。上海是他学术事业的起步之地。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思想日趋保守,他的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古。学术风格大变,似乎完全与西学告别而专治中国的传统之学,使他的学术生涯看起来分成了互相孤立的前后两截。但大变之中又有他一贯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

一 引言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原因,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成了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王国维自身的价值和学术地位,以及他生平中始终未能让人琢磨透的那一面,这是激起学者们研究热情持续不衰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而后人又难以企及的事,他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重要奠基人;二,他在学术上的勇于开拓与他后期保守的政治倾向形成的鲜明反差;三,他晚年原因不明的自沉。因此自80年代开始,王国维便逐步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有关他的文章和书籍,其中既有对他学术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有对他的生平和死因的探讨。然而,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还是综合性的传记研究,都没有把王国维与上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看待。在已出版的有关书籍中,特别是那些传记类著作都写到了王国维在上海的经历,但却没有把这一内容作为重点加以说明,并以此来审视上海对王国维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王国维与上海的联系。因此笔者想就此问题做一番学术上的讨论。

上海在王国维一生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上海是王国维学术事业的起步之地,在这里,他深受新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他最初的学术之路上就留下了不平凡的足迹。他发表于《教育世界》上的一系列文章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学习西方文化的心得。当人们说起二三十年代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以及此时上海的人才荟萃,当然会提到王国维的名字。应该说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王国维是伴随着上海成长起来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上海在王国维的前期生活经历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后期学术倾向大变,有论者认为,他这时所做的学术工作显现出北方人做学问的风格,言下之意,王国维已与早年的学术影响告别了。的确,王国维一生的学术之路多有变化,这成了他作为一个学术大家的重要特点。可以这样说,如何看待王国维一生中的这种变化也就成了认识王国维的一个重要关键点,正因为如此,他与上海的联系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我们去说明。那么,上海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究竟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和作用呢?晚年王国维真的与他早年所受的影响彻底告别了吗?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从东文学社的学员到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这是王国维在上海最初的学术经历。此外,到上海也是王国维独立生活的真正开始,他在这里经受了人生的锻炼。

上个世纪末的上海已不是昔日的乡村了,已成为远东重要的港口城市,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正由于此,王国维于1898年满怀热情地来到上海,因为在家乡时他就渴望去海外留学,苦于没有旅费,迟迟未能如愿,到上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最初在《时务报》馆工作时的思想倾向与这家维新报馆的宣传宗旨颇为合拍。在他父亲王乃誉的日记中就有初到上海的王国维借来《读西学书法》、《农务新法》等书籍阅读的记载。同时在他给朋友的来往书信中也清楚地表现出他倾向于维新的思想。他曾针对当时的局势这样指出:“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得一分就算得一分。”(1)他希望大家都能为改革维新出力。

从他的学业来说,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东文学社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新式教育。这所学校是罗振玉主持开办的,其办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在两年半的学习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在东文学社学了日语和英语,而且还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尽管所学的内容很浅显,但这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他树立科学的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当时,王国维初显的才华已深得任学社中任教的日籍教师藤田博士的赏识,他认为王国维头脑极清晰,善读日文,英文程度也很好,将来会是极有前途的。从学习爱好来说,此时的王国维已对研究西洋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此后的数年中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作为自己主要钻研的对象。

1902年,他曾短暂地赴日本留学。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尽管来往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但与上海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因为这时他又帮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杂志(杂志社在上海),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译著和论著。就译著而言,除了译有《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教育学教科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小辞典》《西洋伦理学史要》《动物学》等书籍外,在《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欧洲哲学家、文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翻译文章,表现出了很强的翻译能力。与此同时,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更值得我们关注。他的第一本文集《静安文集》主要收入了他这一时期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一组文章,其中有:《论性》《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书叔本华之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说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稍后,他又写了《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育)等文章。此外登载在同一时期的《教育世界》上的文章还有:《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学主义》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他接受新式教育和训练,以及钻研西学之后的新境界。由于王国维的文字学术性强,而且持论新颖,在上海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1905年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他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他在这里强调了抽象和分类、综合与分析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特别薄弱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2)在这里,他比出了中西方

的差距,并指出了我国学术的不成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就注意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他就用广义和狭义、主观和客观的区分来对“理”这一传统的哲学命题加以解说,这与传统的那种模糊的论说明显不同。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一个学术高潮的真实记录,与后来不同的是,他这时的行文蕴含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归结起来,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表现出了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学术倾向。王国维认为,在学术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试图去解释宇宙和人生问题,只要“具有解释此问题之一者”,能满足我们知识上的要求,为我们解惑,那么它无论出于中国还是外国,其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应当破除“中外之见”(3)。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在强调大学应该设哲学科,应当学习哲学的同时,还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哲学,还要学习外国哲学。因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先秦的诸子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一样。他说:即使不去论西洋哲学自身的价值,如果要深刻的认识本国的哲学,那么也不可研究外国的哲学。将来能促使我国学术发扬光大的人,必然是兼通世界学术的人,而不会是那些持一孔之见的“陋儒”。在他的眼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是彼此联系的。因此他后来才会进一步指出:“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颺颺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4)在当时的中国,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多见。王国维的这种认识与他同期的学术实践也完全相符。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尽管涉及了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等多个不同的领域,但其思想基础却是共同的,即这几年专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学习所得。由于他运用了西方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来论说中国文化,常常能发前人所未发。他所写的《论性》《释理》《原命》《红楼梦评论》等文章就是如此。直到他于1908年在北京发表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也还是以中西文化的融会为基础的。

其二,追求学术的自身发展,提倡学术独立。这是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多次论述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他力图去做的。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纯粹的学术家。他说,翻开中国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为政治家”,历代诗人也大都从属于政治,而小说、戏曲、图书、音乐诸家,更以“侏儒倡优自处”,历来定位低下,于是他感叹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他认为这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王国维看来,“政治上之势力”是有形的,是可以带来切生利益的;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是无形的,是“生后的”,它的作用会是在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通过长时间的研究,而一旦豁然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将是极为快乐的,其价值也是崇高的,“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他最终归结到这样一点:哲学、美术家应该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保持其独立的位置。联系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现状,王国维掩饰不住自己的强烈不满,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特别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例,指出:康有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谭嗣同的书,人们读它,也并不是为了书中的学术,而是“其在政治上之意见”。因此他们“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在王国维看来,这决不是学术的正途,而是学术的异己。他在联系哲学、文学的实际状况后指出:把学术视为政治的手段,“如此者,其褻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此时正沉浸于康德、叔本华的学说学理中,他发表的这些议论显然是以西方的学术发展为参照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空谷足音。后来顾颉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向来没有研究学问这回事,人们读书。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经世致用。正是这种二千年来不变观念,使得学术界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和创伤。(5)他言语中的含义与王国维所说的基本一致,但前后时间却相距达24年之多。王国维的这种认识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的针对性。就学术自身的发展而言,这些议论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笔者曾在《史林》1998年第4期上发表的《王国维与梁启超》一文中对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另一面有所论及,这里主要是从学术角度立论,因此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

其三,显示出很强的论辩性。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不少文字反映出一种强烈愿望,尤其是对那些在他看来是错的观点和认识,他更要予以辨明,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这与他后来为人处世的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上述关于他对学术从属于政治所表示的异议可以说就是这一明显的表现。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针对张之洞等人轻视哲学,认为哲学有害无益的观点给予严厉的批评。王国维认为不把哲学列入新拟的经科文科大学章程中是不合理的。他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强调哲学是有用之学,并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实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这五个方面来加以论辩,言之凿凿。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余非欲使人人成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重要。”此后,他在《教育偶成》《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对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辩。在具体的教育问题上,他同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时有人针对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多办小学,而中学、大学可以迟一些,即使在小学普遍设立之后再办中学、大学也“未为晚也”。对此,王国维予以坚决反对,他指出:“且欲兴小学,则不可无小学之教师,非受中等之教育不可为也。欲兴中学,不可无中学之教师,而中学教师,又非采高等教育者不能为也。”所以他认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都不应该有所偏废。在一面兴普通教育的同时,还要召集人才“授以专门之学术,庶足以理万端之新政,而供中学之教员”。当时,他把自己所反对的这种观点称之为“平凡教育主义”,后来他又认为这样称还不适当,应该将其改称为“苟且主义”、“颠倒主义”。我们且不论这些论辩的双方究竟谁是谁非,明确的是,这些辩论性的文字反映出了青年王国维满怀激情的一面,而在这激情中所凸显出的则是他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晚年王国维曾为《学衡》杂志转载他早年发表的《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写了一个说明,附在文后。他说:“此文对辜君(鸿铭)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在这里,王国维以其老成的笔调点出了他那时的年少气盛,而这种年少气盛对青年王国维来说却是极为可贵的,因为他在这一阶段所闪现出的很多思想火花可以说都离不开这少年盛。

总而言之,通过对王国维这一时期著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在他学术之路的初期就显现出了很强的学术个性。而他的这种学术个性正是在上海、更准确地说是在《教育世界》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同时又与在上海所受的西学影响密切相关(其实王国维不只是在上海的时候才受这种影响的,在他还在家乡时就已通过上海的杂志来观察社会、接受新学的影响了,因为他与他父亲都曾是《时务报》的热心读者)。可以这样说,上海是这一时期为王国维提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基地。同时这个基地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极佳场所。

当然,王国维在上海取得的学术成果决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当他只身来到上海之后,就肩负起了生活和学者这两副担子,一旁在《时务报》馆工作,一旁在东文学社

学习。由于报馆工作的繁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学习,使他的学业一度举步维艰。他在给好友许家惺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校书籍,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 . .。现在弟已进退两难,有如何可以设法之处,祈筹之。”(6)数个星期以后,他在另一封信中为难地说“弟学东文不能熟读,恐致半途而废。”(7)王国维如此的向朋友求助,向朋友倾吐,可见已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他最终没有放弃,而是通过更加刻苦的学习以使自己的日语水平达到了很好的程度,这其中有罗振玉的帮助,但更在于他自身的努力。对于一个日后成为大学问家的人来说,这样的困难只能是对其意志和人格的一种磨炼。

三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思想日趋保守,他的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古,学术风格大变。尽管如此,他坚持科学研究方法的态度始终未变,而这其中西学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我们要追溯其源头,那么这个重要的源头应该在上海。

1911年11月,他随罗振玉再次赴日本。此时的王国维已没有了当年第一次东渡时所怀有的那种追求新知识的迫切心理和情怀,有的只是对革命的不满,以及对旧王朝的怀念。时隔9年,人同此人,地向此地,但是王国维的心境却是大不一样了。1912年他为日本友人、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赴欧洲写了一首饯行诗,其中写道:“谭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诗中所提到的“文谢”指的是文天祥和谢翱,他感叹为什么没有像文天祥、谢翱这样的人来为清王朝尽忠尽节呢!这颇能反映他当时悲哀的心境。与这种怀旧心理相一致,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中国的传统之学(其学科范围包括古史、古文字、古器物、古地理等方面,但其中心仍然是古史),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就。

与他转向哲学、转向文学的前两次学术转向相比,这次转向(1913年)可以说是他在中年之后的学术定型。因为直到去世,他一直都在这相对固定的领域内耕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与此前不同,经历过这次转变之后,他似乎完全与西学告别而专治中国的传统之学,他过去业已形成的那种用西方学术观点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学术风格一去而不回,这使他的学术生涯看起来分成了互相孤立的前后两截。然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其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以及后人在整理他的学术遗产,评价他的学术成就时,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科学”、“新”等字眼来论说他的学术贡献,而且其大部分主要是针对他后期学术而言的,这与他后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梁启超说他的研究方法极新极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他不仅为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他从事的所有其他领域中都开创并经历了崭新的路程;郭沫若认为:王国维用科学方法来治旧学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顾颉刚则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从这些话和言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国维前后的学术工作中自有一贯不变的东西在,那就是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并没有因为学术转向而有所改变。

当谈到以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的传统之学时,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五四时期那个曾响亮一时的口号“科学整理国故”,胡适是这一口号的主要倡导者。那么,胡适为整理国故提供了哪些科学方法呢?在胡适看来,古代的学术书,缺乏历史进化的眼光,也从来不去讲学术的渊源和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因此通过科学的整理,从这些杂乱

无章、毫无头绪的材料中探寻出一条脉络来,从错误的解说中寻出一个“真意义”来。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胡适所提供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可称之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这主要是从他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与其说它是方法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只是把制度或学说看作是孤立的东西,还要关注它发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背景,并得以了解它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胡适称之为实验的方法,提出: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一切学说思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经过试验,“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8)以后,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上,提出了从三个方向来进行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的这些论说对当时的学术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顾颉刚的《古史辨序》在谈到自己研究古史时,曾写到他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方法。国学家、著名报人曹聚仁在他的自传中还说,他深受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影响。

胡适所说的正是王国维已经做的。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意识,王国维在1911年写就的《国学丛刊序》中已经把科学与史学联系起来加以阐释,他说:“凡事物必尽其意,而道理以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就学理而论,王国维的这番话与胡适之说相比并不逊色。而王国维以下的话则是胡适没有说的,却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思想。他说:“自史学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之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在这里,王国维认为,史学不仅要研究那些真实的符合事理的事物,而且还要去研究那些在后人看来“不真”和“不是”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之所以会出现,一定还有它当时存在的理由。话语间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思维。其中所说的“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则强调了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些文字表达了王国维对探求历史事物演化过程的明确要求,而从他自身的认识来说,这正是王国维所受到的历史进化论和实证科学洗礼的重要表现。其实在时间上,王国维的这番话要比胡适的上述言论还早了七八年。此外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重逻辑,以后又翻译过《辨学》,这使他的著述严密而有条理,为他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在第三次学术转向之后,他再也没有明确地去阐述西学思想,但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及科学实证的思想却融入了他具体的学术工作中。比如,他在《(译本琵琶记序)》中说:“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预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9)他在与同道讨论古代成语时说:“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言语中。若夫《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10)这些言论与他此前强调历史的演化及其因果关系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考察制度的演变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他的《殷周制度论》《汉魏博士考》等著述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总的来说,王国维后期主要做的是实证性的研究,这正像他自己所提出的那样,“要以事实来决事实”。他的这种实证研究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他的综合性。他考虑问题,解决难题总是从多方面入手,而决不会只从一个角度去独立地思考问题。以考释毛公鼎铭文为例,王国维就是这样通过多种途径来进行具体考释的,他认为,现在的人之所以对今日通行的文字都能理解,能

阅读,而对《诗》《书》及那些出土实物上的文字感到难懂,是因为他们对古代的了解不如对现代的了解那么深。所以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他在这里提出的方法是多重的,既要了解时代背景,还要通过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出土实物上的文字变化来互相参证,从而得出较好的认知结果。其中所说的“以验其文字之变”体现了一种动态的眼光,抓住的还是历史的演化。他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也是如此。此前人们历来偏重于文献资料的研究,王国维提出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纸上的材料互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所做的三点归纳其实也正是针对这种综合性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王国维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历史的演化,他的研究体现出了明显的系统性,他先前写的《宋元戏曲考》是这样,随后写的《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也是如此。此外他在完成《史籀篇疏证》后,为了进一步澄清古文字发展史上的误区,他相继发表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史记所谓古文》《汉书所谓古文》《说文所谓古文》《说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说家说》《科斗文字说》等文章,不仅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也使这些文章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王国维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之学的研究中获得很大的成就,并有着开阔的研究视野,除了他中国学问的功底深厚,并吸取了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之外,也与他曾研究过西方学术是分不开的。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讲得最好。作为朋友和同行,狩野深知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价值。他说: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辱,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两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的。

狩野的论说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的基本概括。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北京的最后几年,王国维对西学的态度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这特别表现在他于1924年给溥仪的那封信中。他认为:中国这十余年来,“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原因多半由于西学的影响。他在论及科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他为什么会如此说呢?因为他认为西方在科学的应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但是他说:“史地诸学”倒未受影响。⁽¹²⁾这里他以科学仅供少数人“消遣岁月斯可矣”来形容科学的应有作用近乎刻薄,但他也承认科学的高度发展,其中至少反映出他后期作为一个以考证史实见长的学问家与他所说的“科学”之间的联系。

本文在这里做反复的论证,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后期的王国维并未完全摆脱西学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在起作用罢了。如果说王国维最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这首先又得益于他早先所受的新式教育的话,那么上海对他的影响就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代表新学的上海仍然与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存在着某种联系。

王国维与上海的直接联系,从时间上来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1898年他到上海,至1906年前去北京,在这八年时间里尽管他还辗转于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时间约三至四年,但是他在完成了东文学社的学业后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主编《教育世界》杂志(这个杂志于1908年1月停刊),因此他这时的学术活动重心仍在上海。后期,从1916年由日本回国直至1923年去北京任南书房行走,这七年时间基本住在上海,其主要工作先是在哈同花园编《学术丛编》后在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经学,前后他在上海住了十年多的时间。他的许多重要著作也都在这个城市发表刊印,前期刊印的著作已有述及,后期的重要著作有很多发表在《学术丛编》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毛公鼎铭考释》、《史籀篇叙录》、《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等。他的学术集编《观堂集林》也在上海印行。应该说王国维与上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因为如此,探究他对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王国维所留下的著述和书信中没有多少直接议论上海的文字,但在他的言行中我们能体味到他的真实感受。前期因为他向往新学,所以渴望去上海。其间因脚气病发作,他一度离开上海,但一旦病好之后,他就立刻返回上海。即使在家乡养病期间,他仍关心着《时务报》馆的工作,并特意写信给报馆同仁,提出应该多订一些日文报纸,以增加《时务报》的新闻量。这颇能说明问题。后期,他与上海当时的主流文化明显存在距离,即使他有相当一段时期就身在上海,但是他的心态却是复杂的。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出对上海那时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他说:“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颓废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若商务印书馆者,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矻矻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是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言,亦失计之至。至于政局,则系此种腐败局面之放大而又极端者,不知我载黄之子孙,周孔之后裔乃有此现象。”^⑬信中对当时上海的整个社会状况表现出的不满情绪是十分明显的,他说当时的那种腐败现象要是“在二十年前,则尧香所见此等人当有彭刚直、沈文肃者处以极刑。”言语中怀念的仍是那个旧王朝。其实民国初年,中国的局势恶化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情,王国维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也还是有现实原因的。从文化的层面看,信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评价,说商务出版的书无用也罢,为什么要说是有害之物呢?从商务印书馆发展状况来看,在“五四”之前,其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学校用书,包括中外辞书,以及外国文学作品;至“五四”后,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增加了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影印中国古籍两大方面的出版内容。一般的评论认为,自1918年9月开始出版的《尚志学会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以及此后《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新文化丛书》《世界文学丛书》的陆续出版,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出书的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可是,王国维的这封信写于1918年初,此时正是商务印书馆处于创业以来的低谷,不仅经济上出现了亏损,而且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出版中的一些问题,又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商务印书馆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多年里,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仅以出版的教科书为例,商务印书馆自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至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的十数年间共出版各类教科书达290多种。^⑭从而推动了本世纪初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从王国维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一定不会希望看到早先商务出版的反映辛亥革命的《大革命大写真》《中国革命史纪要本末》《革命文牍摘要》等书籍,同时也未必会愿意看到那些强化共和公民意识的教育读本,以及1916年出版的《戊戌六君子遗迹》这样的书。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正兴起着新文化、新思想的浪潮,正是在这种新思潮的激荡中,上海随之成了全国新文化的中心。当时身在上海的王国维不仅与日渐成型的市民文化存在着距

离,更与新思潮、新文化无法相容。他书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这话倒是言中的,因为在他这封信写出的不久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其中的那个“祸”字,正表达了他的立场。

不过与主流文化存在着距离的王国维,生活在上海却并不孤独,自从清王朝瓦解之后,朝廷的皇公贵族,以及原朝中的官僚大都流向沿海的租界城市,其原因在于租界的特殊地位与制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也正是他们的重要聚集地。与王国维在上海有着密切交往的沈曾植、蒋汝藻等人都曾是旧王朝的官僚。仅管王国维不曾做过官,但他却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感情与好恶,并结下了友情。随后,北京大学慕名而来,想聘请王国维担任教授,罗振玉的意思以王国维受聘为好。但是,王国维却不愿离开上海,他对罗振玉提及此事时说:“马叔翁(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免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¹⁵⁾他其中列出的数条原因,第一条就是“与各处关系甚多”。而这甚多的“关系”其实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这时在上海与他交往的人,大都是一些怀旧心态很浓重的人。

但是,1923年4月,逊帝溥仪的一道“谕旨”命他入直南书房,王国维却不能再顾及“怀土之”和那些“关系”,立即前往北京赴任了。直至他去世,王国维只有在他的长子潜明生重病时回过一次上海。与王国维一生50年相比,他在上海的岁月仅占五分之一,而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前期,时间就更短。然而从王国维的学术发展之路来看,这种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1)《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2)《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引自《王国维文集》

(3)《论近代之学术界》。(4)《国学丛刊序》。

(5)《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所周刊》第62、63、64合刊序。

(6)《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页。(7)同上.第6页。

(8)《杜威与中国》,《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200—201页。

(9)《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10)《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33页。

(11)《回忆王静安君》,见《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345页。

(12)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页。

(13)《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7—238页。

(14)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201页。

(15)《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7页。